

「法域」與「文域」： 帝國內部的表現力差異與殖民地文本

著者：韓基亨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東亞學系教授

譯者：陳允元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中文摘要

這篇論文企圖闡釋一種檢閱上區域性的偏差，此偏差造成對文本——日本帝國內部的閱讀材料——全面性的影響。「法域」意指法律、行政規則等檢閱手段對某地域及其人口集團產生影響的效力範圍。殖民地時期，朝鮮在領土上隸屬於日本帝國，卻被置於與日本內地不同的檢閱標準。這樣的法律區別，導向檢閱過程中嚴密性的差異，且廣泛影響了朝鮮的殖民地知識文化。進一步言，這樣的連繫，成為在殖民地文本與「內地」文本間系統性地建立非對稱結構的背景。作為結果，此非對稱性衍生的明顯差異，在「文域」裡——特定的文學領域，亦即在各個「法域」許可的再現的可能性——被帶出。

而這些現象的起因，並不僅限於法律及其適用。也就是說，日本的出版資本透過帝國而參與其中，這也應被視為產生朝鮮文本之差異性的因素之一。這

些論點顯示了：只有在對國家權力與資本活動的全面檢視之下，才能適切認識殖民地的「文域」。

關鍵詞：法域、文域、殖民地朝鮮檢閱、殖民地文本、出版市場

**"Bōbyōk(法域, Jurisdictional Sphere)"
and "Munyōk(文域, Literary Sphere)" :
The Distinction of Expressing Possibility
and Colonial Texts, Inside the Japanese Empire**

Han, Kee-Hyung

Professor,

Academy of East Asian Studies,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Translator: Chen, Yun-Yuan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is aiming at paraphrasing a kind of regional deviation in censorship which caused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n texts—reading materials inside the Japanese Empire. "Bōbyōk(法域)" means a possible sphere within which the criteria such as law 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acts applied to censorship are in force over the relevant region and its residents. During colonial era, Korea was territorially belong to Japanese Empire but was under the differential censorship criteria—unequal to

Mainland Japan. This distinction of jurisdiction came to be linked to the strictness differential in censorship process, and it generally influenced the culture of colonial intellectual in Korea. By extension, this linkage became a background which established an asymmetrical structure systematically between texts of colony and those of “mainland” respectively. As a result, the apodictic distinction due to this asymmetry was brought about in "Munyōk(文域)"—a certain literary sphere, namely the limits of possibility in representation each "Bōbyōk" allowed.

Meanwhile, the cause of all these phenomena was fundamentally not confined only to law and its application. That is to say, the Japanese publishing capital having worked throughout the Empire should be also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created distinctiveness of the texts in Korea. These views bespeak that colonial "Munyōk" could be properly identified only with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into state power and capital activity.

Key words: Bōbyōk(法域), Munyōk(文域), Censorship in Colonial Korea,
Colonial texts, Publishing Market

「法域」與「文域」：

帝國內部的表現力差異與殖民地文本

一、想像力的空間性分裂

韓國詩人、文藝評論家林和（1908-1953？）¹發表於日本的三首詩：〈曇——一九二七〉（《藝術運動》創刊號，1927年11月）、〈坦克之出發〉（日文，《普羅列塔利亞藝術》，1927年10月）、〈死於病監的男人〉（《無產者》第二號，1929年7月），因被認為內含其所追求的政治文學精髓，自發表之初便受到高度關注。特別是〈曇——一九二七〉，因絕妙結合了高揚的革命意識以及節制的事實描寫，是呈現出革命現代性直率簡潔的傑出作品。這首詩裡，將義大利出身的美國移民勞動者薩可（Nicolas Sacco）以及凡澤提（Bantolome Vanxetti）之死，描繪成一件因布爾喬亞國家權力引起司法殺人的事件，由此正當化世界性反資本主義鬥爭的爆發。

〈曇——一九二七〉的意圖，係栩栩如生地描寫出以共產國際為中心而展開的世界革命過程。林和透過將數字連續排列，暗示革命的骨牌在全世界擴散的樣貌。林和運用使人感到激奮與緊張高漲，和讓人聯想到末世論迫切感的修辭策略，後為詩人、小說家李箱的〈詩第一號〉（《朝鮮中央日報》，1934年7月24日）所繼承²。林和所追求將藝術與政治合為一體的目標，透過此作實驗性地實踐。

¹ 1908年生於首爾駱山。本名林仁植。以詩人、文藝評論家、文學史家、電影演員活躍。特別以歷任朝鮮普羅列塔利亞藝術同盟（KAPF）之書記長、1945年從殖民地解放以降主導「朝鮮文學家同盟」等等經歷，在左翼文藝運動史上做為卓越的理論家、實踐家而享有名氣。1950年韓國戰爭爆發之後，在南朝鮮勞動黨系人士被肅清的時期，遭到北韓政權槍殺。

² 這樣來看林和與李箱作品的共同點，暗示了在韓國的近代文學裡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與現

然而林和在朝鮮發表的詩³，卻顯現出與〈曇——一九二七〉極為不同的特徵。在朝鮮打響林和作為詩人名聲的〈年輕巡邏的信〉（雜誌《朝鮮之光》，1928年4月）、〈十字路的順伊〉（《朝鮮之光》，1929年1月）、〈家兄與火爐〉（《朝鮮之光》，1929年2月）、〈撐傘的橫濱碼頭〉（《朝鮮之光》，1929年9月）等詩，由於革命的必要性與煽動革命鬥爭這樣直接的表達，已經無法公開呈現了。在這些詩作中，關於鬥爭現實的生氣蓬勃的描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反芻關於革命運動之黑暗面者占大部分。其中特別著墨於入獄者的描寫，也與之有關。

必須注意的是，林和發表於朝鮮的詩作，幾乎只把革命的時間侷限在「未來」。革命的狀況無法與「現在」照面，這與〈曇——一九二七〉的時間意識有根本上的差異。可是，將革命封入誰也無法知道的未來時間，是朝鮮左翼作家創作上面臨的重大難關——亦即與檢閱問題——的關係甚深。

在這些詩裡，革命被幽閉在未來的時間之中，係因作者對表達的不可能性感到憂慮而壓抑了想像的自由所致。在這過程裡，感傷與浪漫的抒情、親族間的羈絆等等作為重要的詩歌要素而浮現。無法在作品中顯露對革命的信念，可說削弱了對革命的期待本身。頻繁出現於林和詩中的對家族的呼喚，反映了無法將未來現在化，而不得不返回個人的經驗世界中的殖民地人民的精神結構。

從宣言性的議論急遽地傾斜於獨白語言的林和詩的情調，明白顯現於下列〈十字路的順伊〉的引文之中。林和藉由兄長對妹妹呼喚的形式，象徵與親人的私我關係。接著，他在這裡藏入不能描寫的反權力的政治意圖：

年輕時戰鬥的那隻手

現在以年輕的血在磚牆上畫出日曆

而在這寒冷的夜裡，瘦弱的腳宛若鋼琴的弦般振動著

代主義的內在連帶關係。關於林和的詩，金允植說明這是受到未來派與達達主義之洗禮，而有助於普羅列塔利亞詩之藝術性的典型例子。金允植，《林和研究》（首爾：文學思想社，2000年），頁116-122。

³ 本文中朝鮮指與日帝殖民地處境相關的特定用語，而韓國指一般意義上的稱號。

在〈十字路的順伊〉，林和描繪出被幽禁於監獄裡的社會主義者的身影。然而有著「如鋼琴的弦般振動著」的腳的革命家的衰敗身體，與〈曇——一九二七〉裡描寫的「斯巴達式的勇敢鬥士」的革命前衛身影頗有落差。

在林和刊行於朝鮮的《KAPF 詩人集》(集團社, 1931年)裡, 自己發表於日本的作品一篇也沒有收錄。那應該是擔心不會通過檢閱所致。〈曇——一九二七〉這首詩, 若不透過渡過玄海灘的《藝術運動》的版面, 便無法與朝鮮讀者見面。然而在朝鮮, 《藝術運動》幾乎不可能成為合法且自由販售的刊物。因為其在轉移到朝鮮的過程中, 適用於有關出版品的新的檢閱基準。

很難斷定發表地域的差異, 會決定詩的表現程度與情調。然而巧的是, 可以發現林和詩的發表地域與內容之間有著緊密的連動關係。若林和的例子是自我意識的空間性分裂而導致的結構性現象的話, 僅限定於林和作品的討論, 是不可能清楚說明這個問題的。

二、「法域」的偏差,「文域」的生成

像林和一樣, 許多朝鮮社會主義者, 利用日本與朝鮮的檢閱差異, 設法表達在故國所不能夠表達的。對於殖民地人民來說, 東京成為可以迴避檢閱的避難所, 這一點是饒富興味的。然而他們的意圖, 並不止於得到表現的自由上面⁴。更為重要的目標是: 印製在事前檢閱之下連策劃都不可能的革命出版品, 再將之送回自己的故鄉⁵。

然而, 將韓文的社會主義文獻攜入朝鮮境內, 並不容易。正如雜誌《思想運動》的檢閱紀錄「在朝鮮從創刊號以下」所顯示的⁶, 幾乎都被禁止販賣配送, 或遭到扣押。那是殖民地與「內地」之間儼然存在的檢閱環境的差異所導致的結果。兩個地域在檢閱本質上的差異, 比起處罰的強度, 更可以從書寫

⁴ 當然, 在日本朝鮮人的自由是極其限制的。朝鮮人社會主義者刊行的雜誌《思想運動》因「安寧秩序紊亂罪」而受到販賣禁止、扣押等處分, 圍繞著檢閱發言的各式案例於是登場。

⁵ 殖民地時期朝鮮人刊行於日本的報紙、雜誌目錄, 參照梁永厚作成的〈戰前の在日朝鮮人の新聞、雜誌目錄(戰前在日朝鮮人之報紙、雜誌目錄)〉, 關西大學人權問題研究室, 《人權問題研究室紀要》第50號(2005年3月31日)。

⁶ 《思想運動》2卷1號(1925年8月), 卷頭言。

表現程度的許可範圍中看出。日本也嚴格取締社會主義與色情，但與朝鮮相比，過濾的方式有顯著的差異。可見依地域的不同，而存在著國家檢閱方法上的位階。

筆者希望透過「法域」與「文域」的概念，說明地域之間這樣的檢閱偏差。所謂「法域」，意味著法律、行政規則等檢閱手段，對某地域及其人口集團產生影響的效力範圍，必然反映了國家權力的政策意圖。朝鮮雖被視為帝國日本的領土，然而檢閱法與檢閱行政、檢閱基準等等，與日本相異。不僅如此，朝鮮人與日本人依其身分而適用於不同的法律。即使在朝鮮，日本人也維持著與在「內地」時類似的法律地位。但與此相對，朝鮮人因居住地域的不同而適用於不一樣的法律。由於「法域」的差異，在帝國版圖之中知識文化地域間的非對稱性，也制度性地構築起來。

「法域」的構成，一方面造就了「文域」的生成。所謂「文域」，指的是在各「法域」內所容許敘述之可能性的界限(the limits of the possibility of representation in each jurisdiction)。「文域」對應於合法刊行的文本之總體，而以未完結的流動性為其特徵。「文域」的未完結，係因透過檢閱的運動性導致「法域」的內在體系持續變化的緣故⁷。在整體呈現檢閱的過程及其結果的這一點上，「文域」可說是「法域」的元表象(meta-representation)。

「文域」隨著持續性的重複而成為實體，帶有特定的規範性。舉例來說，回答「應該檢閱怎麼樣的文章呢？」這一類問題的總督府圖書課檢閱事例集，整理出超出規範的韓文資料，可謂公開證實了「文域」的實體存在。具代表性的是作為殖民地檢閱標準的〈朝鮮文刊行物行政處分例〉(《朝鮮出版物概要》，1930年)⁸。在此行政文書中，社會主義出版品的檢閱基準，藉由以下的例文提示。從這裡可以看出，以肯定的口吻談論列寧以及托洛茨基，即是朝鮮境內檢閱的重要焦點。

⁷ 關於國家檢閱的流動性，參照韓基亨，〈殖民地檢閱場域之性質與近代文本〉，檢閱研究會編，《殖民地檢閱：制度、文本、實踐》(首爾：昭明出版，2011年)。

⁸ 關於檢閱標準的問題，參照鄭根植的〈殖民地檢閱與檢閱標準的成立〉，「日帝下韓國與東亞檢閱相關的新接觸」國際工作坊資料集(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6年12月7日-8日)。

(一) 啊，兩年前同月同日的下午六時（在朝鮮是正午）！偉大的破壞者、同時也是建設者的列寧，真的逝世了。然而，在他逝世之後，勞農的基礎也葉盛根深。即使在死後歷經兩年的今日仍煥然一新，絕不使人感覺陳舊，毋忘偉大的創造者嘞！（《東亞日報》，1926年1月21日）

(二) 以前，在俄國革命起事的時候，拯救他於國際的蹂躪、防止內亂之災禍者，正是托洛茨基的赤衛軍。（《東亞日報》，1927年2月11日）

藉由此類禁忌的發動，在朝鮮要論及社會主義俄國與革命運動的實情，是相當困難的。朝鮮最具影響力的雜誌《開闢》所報導的：「勞動階級的同盟，成為赤俄（俄國）革命勝利的最大助力。赤俄革命史給與人類解放運動巨大的影響」⁹等也成為問題，在1926年8月遭到強制廢刊。

然而與此相對，在日本的狀況卻不一樣。二〇年代以降，朝鮮人想越過對殖民地人民強制的表現界線——亦即「文域」的限制——的嘗試，藉由《思想運動》、《理論鬥爭》、《現階段》、《藝術運動》、《無產者》等在日本刊行的韓文社會主義雜誌而實行。將之與《新生活》、《開闢》、《朝鮮之光》這些朝鮮內的媒體相較以觀，「內地」與殖民地之間的表现差異，在此就相當清楚。說到底，就是社會主義者們能否直接表達自身的思想認同。

在日本刊行的韓文社會主義刊物，許多是為特定的運動路線與組織具體代言。《思想運動》反映了一月會¹⁰的立場，《藝術運動》與《無產者》反映 KAPF 新世代¹¹的立場。然而作為「朝鮮共產黨」的機關誌、也是當時代表性社會主義雜誌的《朝鮮之光》，就難以探求這樣的關係樣態。和 KAPF 的機關誌《藝術

⁹ 《開闢》第 72 號（1926 年 8 月），頁 28。

¹⁰ 1925 年 1 月 3 日，東京的朝鮮人留學生安光泉、李如星、河弼源等，將迄今為止的北星會發展而重組的社會主義思想團體。發行韓文機關誌《思想運動》與《大眾新聞》。

¹¹ 「KAPF 世代」，指的是趙重滾、金斗鎔、韓植、洪曉民、李北滿的「第三戰線派」，與金南天、林和、權煥、安漢等「無產者社」關係者。以他們為中心，1927 年以降，在朝鮮左翼藝術運動的政治鬥爭正式開始。參照權寧珉，《韓國階級文學運動史》（首爾：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3-4。

運動》同時期刊行的《朝鮮之光》第 73 號（1927 年 11 月）的目次裡，社會主義革命相關的具體表現幾乎不存在。不穩的表現，也幾乎謹慎地深藏於文章的內容之中，或是因事前檢閱而被消除了。

這些差異的原因，在於韓國與日本的檢閱基準與檢閱慣行的不同。殖民地檢閱當局，將韓國人社會主義者在日本刊行而攜入朝鮮的書籍，分類為「必須特別注意」¹²的極危險出版品。其理由係因，這些刊物以殖民地的現實為根據，強烈煽動朝鮮社會需要革命性變化的必要性。其因使用韓文而提高在朝鮮的可讀性這一點，也是這些出版品更加被危險看待的主因。

1920 年末，在東京朝鮮人發行的 28 種出版品之中，有 22 種與反帝國主義運動有所關聯。特別是其中有 8 種連續刊行的刊物，在朝鮮成為販售配送禁止以及扣押的對象，受到「特別待遇」。

〈表一〉 在東京朝鮮人發行注意報紙雜誌一覽表（1927-1928）¹³

題名	法律根據	報導內容	創刊日	部數	發行人	備考
《學之光》 （韓文）	出版法	民族、社會	1911 年 9 月	1,000	朴亮根	學友會機關紙，不定期
《朝鮮勞動》 （韓文）	新聞紙法	政治、勞動、 社會	1925 年 8 月	1,000~ 3,000	金相哲	在日本朝鮮勞動總同盟，機關紙
《青年朝鮮》 （韓文）	新聞紙法	政治、勞動、 社會	1926 年 8 月	約 1,000	方致規	東京朝鮮青年同盟機關紙
《新運動》 （日文）	新聞紙法	社會、朝鮮	1925 年 9 月	1,000~ 3,000	李達	捐款於募款時提供
《大眾新聞》 （韓文）	新聞紙法	社會、民族 （共產）	1926 年 6 月	1,000~ 1,500	崔益翰	螢雪會（舊一月會系列）機關紙
《黑友》改題 為《自由社會》 （韓文）	新聞紙法	社會（無政府）	1927 年 6 月	1,000	李弘根	黑風會（黑友會）機關紙

¹² 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圖書課，《新聞紙出版物要項》（朝鮮：朝鮮總督府，1928 年），頁 114。

¹³ 此表係根據《新聞紙出版物要項》（1928 年）與《朝鮮に於ける出版物概要（在朝鮮的出版物概要）》（1929 年）作成。

《女子界》 (韓文)	出版法	民族、女性	1927年1月	1,000	李淑鐘	女子學興會 機關紙
《新朝鮮》 (日文)	新聞紙法	社會、朝鮮	1925年9月	約2,000	姜世聲	捐款於募款 時提供
《新興科學》 (韓文)	出版法	社會	1927年3月	1,000	李丙鎬	新興科學研 究會機關紙
《理論鬥爭》 改題《現階段》 (韓文)	出版法	社會	1928年7月	不明	張準錫	在京佐益團 體機關紙

殖民地檢閱機關之所以警戒在日本刊行的韓文社會主義媒體的移入，並不是因為那些雜誌是朝鮮的出版品，而是其具有非法地下流通的可能性。在日本，由於在發行三日前必須完成將印刷品兩冊送至內務省作為納本的出版手續，即使受到發售禁止等等行政處分，出版品也能夠選擇無損於內容的地下流通管道。那是日本的左翼出版品具有的一個特權¹⁴。

然而在朝鮮，由於出版品施行刪除與沒收等事前檢閱的嚴厲管控，難以擁有活化地下流通市場的內容資產。朝鮮人被迫馴服於檢閱機構的要求，或是徹底否定國家權力的出版控制，二者擇一。像在日本那樣的出版品靈活的生存方式，在殖民地是絕不被允許的。

國家權力與出版資本圍繞著表現程度而事前調節的「內閱」問題，提供給我們理解日本與朝鮮出版環境差異的重要線索¹⁵。這裡再次以知名的中野重治的〈下雨的品川站〉作為例子。1924年2月，中野重治的〈下雨的品川站〉以意義難辨的伏字狀態，刊登於雜誌《改造》。那是為了避開其詩暗示的天皇的暗殺——亦即「大逆」的可能性¹⁶，施行「內閱」的結果。

1928年4月13日，日本的內閣會議全場一致決定言論的「嚴格取締」。鈴木內相立即找來山岡警報局長，命令其對即使受到販賣禁止也不見反省之色的

¹⁴ 高榮蘭，〈帝國日本的出版市場與戰略性非合法商品的資本化競爭——以1930年代前後的檢閱與不逞鮮人媒體為軸心〉，「近代檢閱與東亞」學術大會資料集（首爾：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人文韓國（HK）事業團共同舉辦，2010年1月22日）。

¹⁵ 關於「內閱」，參照紅野謙介，〈檢閱と文學——1920年代の攻防（檢閱與文學——1920年代的攻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第四章〈內閱という慣行（所謂「內閱」慣行）〉。

¹⁶ 金允植，〈林和研究〉，頁244。

報紙雜誌，「處以比司法處分更甚的發行禁止極刑」¹⁷。而此時的《改造》，得到了「係最近採取非常激進的態度的雜誌，要大大加以注視」的評價。《改造》可說一面以強化自我檢閱以配合政府政策的步調，同時藉加入伏字的狀態刊載中野重治的詩，營造出作為政治犧牲者的媒體形象。其一方面為了生存而妥協，另一方面維持作為知識商品之權威，同時追求著這兩個目標。

然而朝鮮出版資本的狀況，無法擁有像日本這樣一方面維持著自己的出版政策、同時與國家權力共謀的社會環境。「內閱」未必全然不存在，不過是特殊的例子。「內閱」意味著出版資本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力學平衡，或以利害關係之一致為前提的協商過程。然而在朝鮮，不可能存在那樣的力學平衡與利害關係一致的情形。幾乎所有朝鮮的出版品都受殖民地出版法的限制，而其法律的核心旨趣，是在於原稿的事前檢閱上面。所謂「事前檢閱」，可說是說明殖民權力對於殖民地文本行使單向影響力的一個用語。

1929年5月，在日本刊行的韓文社會主義雜誌《無產者》，將〈下雨的品川站〉全文翻譯成韓文，以幾近完整的狀態刊載¹⁸。那可能是因為《無產者》並非以合法生存作為最終目的。對《無產者》而言，沒有理由透過「內閱」與日本檢閱當局共謀。因為在日本與朝鮮地下流通的管道敞開，而最大部數未滿三千的雜誌也沒有因商業理由而妥協的可能。若是《無產者》這樣的社會主義雜誌嘗試「內閱」的話，連其自身小而不安定的出版市場也難以守護了吧。因為想閱讀《無產者》的朝鮮人，都是嗜好高危險性雜誌的那一類人。

1936年10月，在「朝鮮共產黨再建京城準備團體機關紙部」發行的《赤旗》第一號裡，含有以下的內容。然而《赤旗》本身是典型的非法文書。

對那些傢伙來說，《赤旗》是大敵，同時也是彈壓的唯一物證。配送者諸君，為了從版面消去其他同志的指紋，我們收到時將所有的版面以自己的手擦拭吧。《赤旗》是我們的座右銘。讀了一定要燒掉。手上拿著《赤旗》的時候，嚴禁徘徊、拜訪、散步。行走於街的時候，避開十字路口

¹⁷ 《東亞日報》(1928年4月17日)。

¹⁸ 在此翻譯裡，可以看見一些將「天皇」代為「××」這樣形式的伏字。

等視野良好的場所，要特別注意死巷、好好地環顧四周，若發現疑似間諜者，迅速隱藏自己的行蹤。¹⁹

基於國家制定的法律體系與行政規則刊行的出版品，違抗國家的命令而於地下流通，可說是嚴重的問題。然而在處分的法律主體明確的這點上，其這種狀況很難說是到了根本性否定國家秩序本身的程度。不過，《赤旗》拒絕國家權力關於出版的要求，跨越了實定法的界限。因此像《赤旗》這樣的所謂「不穩文書」，並不受特定「文域」的影響。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在傳播於公眾的文字媒體場域之中，想像的自由都能透過文字完整表達的可行性。如果有出版品不考慮國家的合法範疇與控制臨界，此係脫離了近代出版品一般的生存環境，可說是全新層次的問題。

三、兩個出版市場與殖民地「文域」的混亂

接近二〇年代後半，在朝鮮刊行的日本人出版品具有的獨特意義，幾乎喪失殆盡。在朝日本人出版的不振，是嚴重受到從「內地」直接進入的移入出版品影響。朝鮮總督府圖書課指出，「最近被從內地移入的刊行物壓倒，經營相當困難，除了特殊情況以外，都不及內地的出版品，因此經營入不敷出，發行亦不振」（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圖書課，《新聞紙出版物要項》，1928年，頁33），說明在朝日本人出版業的現況。

移輸入朝鮮的報紙、雜誌的總數，1919年有51,594部，1930年增加至325,030部。顯示在三·一運動以降的11年間，在量的方面有629%的擴大。若加上單行本的輸入量，移輸入出版品的總量就更為增加。此外，1927年度的266,397部中有99%是從日本的移入²⁰出版品，輸入出版品中來自中國者有1,255部，來自其他外國的有971部（共計2,226部），連移輸入出版品整體的1%都不到。此數值顯示了歷經「文化政治期」，朝鮮社會急速地隸屬於日本的出版市場²¹。

¹⁹ 《赤旗》第1號（1936年10月20日）。金晁一，《李載裕研究》，（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93年），頁302，資料一。

²⁰ 「移入」的用語係意味著在日本刊行的出版品運入朝鮮境內，「輸入」係在日本以外的外國刊行的出版品運入朝鮮境內。

²¹ 這些統計與〈表二〉，係基於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圖書課所作成的出版警察年報《新聞紙要覽》（1927年）、《新聞紙出版物要項》（1928年）、《朝鮮に於ける出版物概要（在朝鮮的

〈表二〉 在日本刊行的主要報紙・雜誌之朝鮮境內移入量（部數）

	區分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1929年	1931年	1934年	1935年	1937年	1939年	1940年
《大阪每日新聞》	總數	44,184	48,327	50,861	48,853	45,804	57,258	59,574	73,334	83,339	92,970
	朝鮮人購讀	1,881	1,746	2,503	2,566	3,258	5,374	6,062	8,930	14,319	23,143
《大阪朝日新聞》	總數	36,528	34,799	42,242	41,572	41,229	54,981	57,694	66,276	72,859	90,529
	朝鮮人購讀	1,658	1,411	3,255	2,046	2,757	5,723	6,258	7,962	12,527	20,495
《キング（國王）》	總數	13,753	16,224	20,487	17,693	20,248	31,074	34,390	34,593	41,994	43,419
	朝鮮人購讀	386	810	1,121	1,248	1,716	4,715	5,007	7,007	10,763	13,925
《主婦之友》	總數	7,704	10,004	12,946	14,555	18,944	27,536	30,393	29,509	34,259	36,833
	朝鮮人購讀	42	393	342	532	398	1,830	1,748	3,148	6,283	8,507
《改造》	總數	1,195	2,940	2,907	2,820	3,605	3,902	4,050	3,540	4,922	5,745
	朝鮮人購讀	164	572	306	254	401	670	676	828	1,435	2,082
《中央公論》	總數	1,486	1,358	1,454	1,458	2,511	2,898	3,310	3,891	3,181	4,384
	朝鮮人購讀	98	167	116	61	213	450	484	904	1,271	1,418
《無產者新聞》	總數	436	280	381							
	朝鮮人購讀	428	237	367							

出版物概要》（1929年、1930年、1932年）以及《朝鮮出版警察概觀》（1934年～1940年）等等資料而完成。

《解放》	總數	114									
	朝鮮人購讀	26									
《進め(前進)》	總數	131									
	朝鮮人購讀	125									

關於日本出版資本進入朝鮮，朝鮮總督府相關人士表示：「刊行物的輸移入的傾向如實呈現朝鮮文化向上發展的證據，應是可喜的現象」（〈新聞紙雜誌輸移入及其種類數量〉，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圖書課，《新聞紙要覽》，頁 16），給予積極的評價。然而另一方面，日本出版品移入的增加，也給殖民地檢閱當局造成新的煩惱。要言之，因考量到隨著「內地」出版品移入增加，被輸入朝鮮境內的不穩內容也就更多，故必須在這些內容輸入朝鮮境內之前予以攔截。總之，那意味著檢閱需求的膨脹。日本的出版品牴觸殖民地「法域」之基準的可能性也隨之提高。

「要進入京城的各日本報紙因當局的忌諱而遭到扣押」這樣的報導，從二〇年代初期開始在韓文報紙上頻繁登場，導致「這一些刊物的輸移入對民眾思想的影響也不少，所以對於這方面要特別注意」（〈新聞紙雜誌輸移入及其種類數量〉，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圖書課，《新聞紙要覽》，頁 16）的狀況。

從〈表二〉可知，移入媒體部數的擴大持續延續到 1926 年。進入三〇年代之後，韓國人的讀者數量也急速增加。然而移入量增加的背後，關於出版品積極監視的努力也始終存在。從〈表三〉可知，從日本輸入的出版品在朝鮮境內受到檢閱行政處分（3,006 件），較朝鮮外的官廳通報者（651 件）多出 461%。此數值顯示移入過程的檢閱程度之高。

表三 移輸入出版品的行政處分件數（1926-1930）²²

發行地	發現原因	區分	治安妨害	風俗敗壞	合計
內地	朝鮮外官廳 通報	報紙	425	31	456
		雜誌	151	44	195
	朝鮮內檢閱	報紙	2,970*883	1*103	2,971*986 ²³
		雜誌	35		35
國外	朝鮮外官廳 通報	報紙	13		13
		雜誌	8		8
	朝鮮內檢閱	報紙	1,690*252	*2	1,690*254
		雜誌	1		1
計		報紙	5,099	32	5,131 (*1,240)
		雜誌	195	44	239

對從日本輸入的出版品所施行的檢閱相當嚴密，但對於從帝國領域之外輸入的出版品，則施行更高層級的控制。從 1926 年到 1930 年的五年之間，日本出版品與外國的出版品的行政處分件數，分別是 3,657 件與 1,712 件。朝鮮總督府檢閱當局對日本以外的出版品的行政處分件數，是從日本移入的出版品之處分數的 46%。在移輸入報紙、雜誌的總部數中，日本以外的地域的比重未滿 1% 已如上述。若兩相比較，會發現朝鮮檢閱當局對日本以外的出版品的行政處分件數，數值高得驚人。在比較國外出版品與日本出版品，行政處分率要比移入量比率高上 46 倍的高數值，可判斷這是施行特別政策的結果。可說顯現了朝鮮檢閱當局對於輸入（日本以外）出版品的極端緊張感。

從 1926 年到 1940 年的 14 年之間，《大阪每日新聞》增加了 110% 的移入量，《大阪朝日新聞》147%、《キング（國王）》216%、《主婦之友》378%、《改造》381%、《中央公論》的移入量則增加了 195%。同時期朝鮮人的購讀者數，《大阪每日新聞》增加了 1,130%、《大阪朝日新聞》1,136%、《キング》3,508%、《主

²² 〈表三〉由於係限定於根據新聞紙法與新聞紙規則而發行者的統計，基於出版法而刊行的出版品的檢閱不在統計範圍。此表基於《新聞紙要覽》（1927 年）、《新聞紙出版物要項》（1928 年）、《朝鮮に於ける出版物概要（在朝鮮的出版物概要）》（1929 年、1930 年、1932 年）等等構成。

²³ 1928 年度的資料，報紙、雜誌的種類與發現原因沒有個別區分，僅記載其總數。此表格中「*」的記號，因 1928 年度的資料記載的總數沒有統計計入，係表示另外表記。因此，〈表三〉的 986 件與 254 件裡，係報紙與雜誌的行政處分件數之混合。

婦之友》20,155%、《改造》1,170%，《中央公論》增加了1,347%。雜誌比報紙更急速地普及、韓國人購讀者比率的上升，引人注目。

然而二〇年代後半以降，在朝鮮的五大日本媒體的普及擴大和社會主義相關媒體的退潮，是相互關連的現象。受到朝鮮總督府特別關注的《無產者新聞》在1928年以降從朝鮮出版警察年報的對象中解除了，而《解放》與《進め（前進）》僅在1926年被一度言及，之後也從年報對象中解除。從年報的統計對象中解除，意味著幾乎沒有移入朝鮮的情事。總督府對《無產者新聞》重度的憂慮，起因於此報紙的購讀者主要是韓國人。總督府為了切斷日本與朝鮮社會主義運動的連繫，使人們根本沒辦法在朝鮮購得此種報紙。與此相反，與《無產者新聞》一同被分類為「刊載（社會——引用者）主義色彩報導的報紙雜誌」（〈新聞紙雜誌輸移入及其種類數量〉，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圖書課，《新聞紙要覽》，頁17）的《改造》，在朝鮮的販賣並未受到特別的限制。

由於日本出版品移入朝鮮境內的普遍化，在朝鮮的出版市場，開始明顯地二分為日文市場與韓文市場。關於它們的競爭，尚未解明的點甚多。然而與殖民地的知識文化有著深刻關係的檢閱政策，對這兩個出版市場的關係產生巨大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因為無論讓日本的出版品檢閱基準與朝鮮的「文域」吻合，或是使之比朝鮮寬鬆，市場的反應都不得不產生變化。若是朝鮮人想要擺脫殖民地「文域」的低俗，與放寬移入出版品的檢閱基準來支援日本出版資本的殖民地檢閱政策結為一體，那麼韓文出版市場的萎縮就再明確不過了。

一般來說，殖民地朝鮮的出版市場被分化為「封閉的雙重狀態」。在朝鮮，日文出版品與韓文出版品雖然共存，韓文出版品進入「內地」者幾乎沒有，無法仿效日本出版市場的擴張。朝鮮的出版市場，不過是被日本出版市場包圍的一個「地方市場」。

然而，即使是那樣必然的位階性，都難以維持。儘管比起日本的出版市場，朝鮮的出版市場是非常小規模的，其出版市場的成長與對外擴張卻遭受制度性的限制。所謂殖民地檢閱，是規範這種出版市場可變性的重要國家制度。檢閱將重點置於思想控制與精神規訓，另一方面對於知識資本的掌握，也投以高度的關心。由於殖民地檢閱而產生日本與朝鮮在書寫表現能力上的差異

本身，才是在韓國出版市場中，形成韓文出版品與日文出版品所處生產環境有所差異的主因。

與這一點相關的，在朝鮮《改造》的販賣被持續地容許，可理解為日本出版品蠶食朝鮮境內的思想文化領域的現象。若《改造》的例子是檢閱當局出於政治目的的話，那麼這意味著檢閱當局以出版市場競爭的方式，間接控制朝鮮整體知識文化的做法得到成功。1939年在朝鮮販售量達到4,922部，這給《改造》的經營帶來怎樣程度的幫助尚不明確。然而，在朝鮮社會《改造》的存在與走向，形成與販賣量不同層次的意義網絡。

根據業者們的證言，各個地域賣書的傾向不同。在最初落腳於朝鮮社會，由於當時在內地不太賣得掉的思想與經濟相關的書籍受到歡迎，拿到台灣卻完全賣不掉。(中略)作為出版資本之包袱的「幽靈」們被放逐到殖民地時，卻帶來利益，變身成為能賺錢的商品。²⁴

高榮蘭提出的殖民地狀況，正是與朝鮮「文域」有關聯，引起筆者很大的興趣。因為對日本的出版業者而言，朝鮮不過是處理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的地方，然而在朝鮮人書籍購買者購入庫存商品的過程裡，卻得到了擺脫長時間被壓抑的殖民地「文域」界限的機會。然而我們要記住，為了擴張認知的界限而不得利用「內地」出版品——這樣的殖民地人民的現實，最後卻製造出帝國連被支配者的不穩欲望也寬容接受的弔詭意象。

進入三〇年代，由於規模劇烈擴大的日本出版市場的影響，「法域」誘導「文域」的狀況為之一變，產生了即使在相同「法域」之內，出版品也因資本的性質而有不同表現程度的狀況。其結果是，弱化了「內地」與「殖民地」的空間區別，使得在差別化機制中的出版資本的影響力，產生更多得以介入的餘地。到了三〇年代後半，在朝鮮社會普遍對殖民性的自我意識稀薄化的同時，是否可說是與這樣的間接控制之擴大有所關連的現象呢？

²⁴ 高榮蘭，〈帝國日本出版市場的重組與媒體事件——以「張赫宙」作為媒介的1930年代前後改造社的策略〉，《사이／問／SAI》第6號（2009年5月），頁134。

對照「域」的問題與殖民地的出版市場的關係，同時檢討日本文學翻譯成韓文的狀況，可知即使把翻譯與翻案全部合起來計算，數量仍相當的少。不僅如此，這些幾乎都是與日本文壇主流傾向有所距離的作品。看了這些出乎預料的事實，筆者對於近代知識的地域間移動，以及其與殖民地的關係上面，有了新的想法。

在 1910 年以前，被翻譯成韓文，或作成翻案小說的作品，有矢野龍溪的政治小說《經國美談》、末廣鐵腸的《雪中梅》；一〇年代有德富蘆花的《不如歸》、渡邊霞亭的《想夫憐》、菊池幽芳的《己之罪》、尾崎紅葉的《金色夜叉》、柳川春葉的《非親生關係》等等。進入二〇年代其數量更為減少，大概有中西伊之助的《熱風》與《汝等的背後》等等。很難相信這個時期是所謂普羅列塔利亞國際主義的全盛期。

然而日本語文學的翻譯，在總體戰時期活潑地進行著。查看在總督府的意志介入下的雜誌《文章》²⁵「戰線文學選」的目錄可以知道，以著名的《麥與軍隊》作者火野葦平的〈土與軍隊〉、〈菸草與軍隊〉為開端，林芙美子的〈戰線〉與〈星光燦爛的一夜〉、〈戰場的道德〉，德永進的〈大部隊之敵〉、尾崎士郎的〈陸軍飛行隊〉與〈非戰鬥員〉等等三十三篇作品，均被翻譯成韓文²⁶。

比照朝鮮與日本的密切關係來思考，由於被翻譯、翻案成韓文的日本文學的貧乏，且被翻譯、翻案的那些作品具有的強烈的偏重性，可說是極端呈現了近代韓國與日本文化關係的實際狀態。關於日本文學的翻譯狀況本身，是有必要更進一步討論的題目。然而比起日本文學的韓文翻譯、翻案目錄之貧弱問題，筆者在本稿的關心，是希望考察為何發生這樣的狀況。究竟在殖民地朝鮮，所謂「不被翻譯的帝國」，是具有怎樣意義的社會現象呢？

這裡應該有幾個理由。第一，由於許多朝鮮知識人獲得了運用日文的能力，除了他們之外的購買者有多少，是難以預測的。這一點有必要指出。第二，包

²⁵ 1939 年 2 月 1 日，在京城創刊的文學綜合雜誌。以鄭芝溶的詩與李泰俊的小說為中心，帶來 1930 年代後半韓國文學的盛況。由於戰時體制下韓文媒體的彈壓政策，1941 年 4 月，於通卷 26 號廢刊。

²⁶ 朴光鉉，〈檢閱官西村真太郎與朝鮮語文〉，林榮澤、柳浚弼、韓基亨、李惠鈴編，《被動搖的語言》（首爾：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 年）。

括開闢社等朝鮮的主要出版社，相當排斥為了補充自身的媒體內容而翻譯日本的知識與文化。這能以民族主義來理解。然而其在另一方面，可說也有著因不得不選擇掌握「地方」市場的土著出版資本，所必然產生的排他性問題。因為要在朝鮮出版市場維持支配力，取決於能否擁有無法仿效的出版材料。第三，從檢閱的觀點來看，翻譯日本事物常常包含著未知的危險性。如上所述因「文域」的偏差，被翻譯的內容能否通過殖民地朝鮮的檢閱這個問題，在日本文學的韓文翻譯上，成為恆常性的限制。例如將堺利彥翻譯的威廉·莫理斯(William Morris)的《News from Nowhere》(1891年)²⁷介紹至朝鮮的鄭柏，為了避免翻譯社會主義思想與文化可能引起的嚴重危險，拼命地隱藏作品的來源係堺利彥以及莫理斯²⁸。

從這些理由，日本知識文化的韓文翻譯並不積極進行。然後，隨著日本出版市場在朝鮮擴張，翻譯的問題更是遠離了人們的關心。在這之中，國策文學之所以被大量翻譯，是因為這些作品係無必要檢閱的文本。做為朝鮮總督府核心檢閱官的西村真太郎將《麥與軍隊》(1938年)翻譯成韓文，而總督府將之免費發放的這件事實²⁹，象徵性地告訴我們：在帝國的權力不介入的情況之下，於殖民地翻譯帝國文學是何等的困難。

四、結語

若不考察「文域」的問題，我認為就不能夠深刻理解殖民地人民的文章。帝國的膨脹施以韓國近代語文秩序的強大壓力，在殖民地人民的文章之中處處留下痕跡。殖民地人民若不正確地理解被強加於自己的「文域」的外延及其內涵，就不能夠安全地傳達自身的意思。

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由於「文域」的流動性，其合法性的發言基準本身是極不穩定的。由於這樣的限制掌握了殖民地人民的發言欲望與文字表現的全

²⁷ 威廉·莫理斯(William Morris)著，堺利彥譯，《理想鄉》(東京：平民社，1904年)。

²⁸ 韓基亨，〈《開闢》的宗教理想主義與近代文學的思想化〉，林京錫、車惠英等著：《投影於《開闢》的殖民地朝鮮的容顏》(首爾：모시는 사람들，2007年)，頁438-439。

²⁹ 同註26，頁402。

部過程，殖民地人民陷入了自我認知及其文字再現過程難以體系化的狀況當中。因此，比起殖民地以外地域的人們，殖民地的人民不得不對非正規的發言／表達更為敏感。這暗示著在殖民地所進行語言秩序的近代性均質化過程中，必然內含非均質性因素的自我矛盾結構。

整合合法性與發言目的的意圖，或用別的方式來說——即使有反殖民的意圖，由於必須將之置於殖民地檢閱所設定的界限之中，也就是對合法性的強迫觀念，產生了言說內容的倒錯與異質性。言說內容的倒錯與異質性，往往被理解為殖民地文化未熟性的種種標誌，或用以貶抑殖民地人民知識活動的證據。韓國的近代小說史沒有世界留名的「偉大鉅作」的情結背後，可以發現不得不將殖民地的特殊環境從非殖民地³⁰的觀點（更嚴重地說——帝國的觀點）加以評價的這種弔詭殖民性的長期慣性影響。然而，如果以新的分析方法來思考殖民地人民的發言方式，那麼那樣的「非規範性」或「異質性」，便應被重新評價³¹。

這樣的觀點，在促進殖民地文學應透過殖民地本身的文學生產機制進行分析之必要的同時，也內含著解釋既有的美學體系的近代文學的界限，必須透過殖民地特殊性理解來補充的問題意識。而本稿討論的關於「域」的問題，能夠置於顛覆迄今為止每每被非殖民地理論壟罩的學術慣行，以殖民地歷史現實本身的結構為基礎，重新解釋關於殖民地人民面臨的特殊局面的一系列努力的過程之中。

³⁰ 所謂「非殖民地」之用語的選擇，包含了殖民地的「外部」不應作為將殖民地相對性地價值化的主體——這樣的意圖。為了分析殖民地文化的特質，應闡述明白殖民地人民不得不以特別的方法表述自身，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然而，以將西歐的學術成果普遍化的理論與分析框架，並不能完全掌握其實際情況。韓國近代文學研究的侷限，幾乎都從這裡產生。韓國的近代文學，主要是在殖民地時期形成，為了分析殖民地這個複雜地相互重疊的異種時空，不得不充分思考什麼樣的獨自體系與基準是必要的。近二十年之間，與後殖民主義相關的論述很多，但在韓國社會之中不能擔任「知識啟蒙」以上的角色。為了深刻理解殖民地，必須有意識地與急著將殖民地的「外部」以及殖民地連結的普遍化欲望，保持距離。

³¹ 關於這一點，請注意李惠鈴〈監獄或不存在的時間：殖民地朝鮮的社會主義者表象及其可能性的條件〉，《大東文化研究》第64輯（首爾：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年）。（日本語譯：李惠鈴著，酒井裕美譯，〈監獄或不存在的時間：殖民地朝鮮的社會主義者表象及其可能性〉，《文學》11號2卷，2010年3、4月號）的問題意識。

參考資料

一、專書

林京錫、車惠英等著，《投影於《開闢》的殖民地朝鮮的容顏》（首爾：모시는 사람들，2007年）。

林榮澤、柳浚弼、韓基亨、李惠鈴編，《被動搖的語言》（首爾：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年）。

金允植，《林和研究》（首爾：文學思想社，2000年）。

金昞一，《李載裕研究》（首爾：創作與批評社，1993年）。

威廉·莫理斯著，堺利彥譯，《理想鄉》（東京：平民社，1904年）。

紅野謙介，《檢閲と文學——1920年代の攻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

朝鮮總督府警務局圖書課，《朝鮮に於ける出版物概要》（朝鮮：朝鮮總督府，1929、1930年、1932年）。

—————，《朝鮮出版警察概觀（1934年～1940年）》（朝鮮：朝鮮總督府，1940年）。

—————，《新聞紙出版物要項》（朝鮮：朝鮮總督府，1928年）。

—————，《新聞紙要覽》（朝鮮：朝鮮總督府，1927年）。

檢閲研究會編，《殖民地檢閲：制度、文本、實踐》（首爾：昭明出版，2011年）。

權寧珉，《韓國階級文學運動史》（首爾：文藝出版社，1998年）。

二、單篇論文

高榮蘭，〈帝國日本出版市場的重組與媒體事件——以「張赫宙」作為媒介的1930年代前後改造社的策略〉，《사이／間／SAI》第6號（2009年5月）。

———，〈帝國日本的出版市場與戰略性非合法商品的資本化競爭——以1930年代前後的檢閲與不逞鮮人媒體為軸心〉，「近代檢閲與東亞」學術大會資

料集（首爾：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人文韓國（HK）事業團，2010年1月22日。）

李惠鈴〈監獄或不存在的時間：殖民地朝鮮的社會主義者表象及其可能性的條件〉，《大東文化研究》第64輯，首爾：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年。

梁永厚〈戰前の在日朝鮮人の新聞、雜誌目錄（戰前在日朝鮮人之報紙、雜誌目錄）〉，關西大學人權問題研究室，《人權問題研究室紀要》第50號，2005年3月31日。

鄭根植〈殖民地檢閱與檢閱標準的成立〉，「日帝下韓國與東亞檢閱相關的新接觸」國際工作坊資料集（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6年12月7日－8日。）

三、期刊報紙

《赤旗》第1號，1936年10月20日。

《東亞日報》，1928年4月17日。

《思想運動》2卷1號，1925年8月。

《開闢》第72號，1926年8月。

